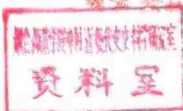


1912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第二十五辑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44/29/26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1987年5月

封面设计：容 子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25辑

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目 录

回忆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补充.....

.....欧阳可羽 (1)

开明绅士陈照薇先生.....曾国棠 (15)

《新会周报》的始末.....伦海滨 (23)

新会县拆城筑路的经过.....

.....莫荣坊、许仲桃 (28)

几次加速自我改造誓师大会的回忆.....

.....何卓坚 (41)

新会县田径之乡——外海.....林智文 (44)

孔庙忆拾.....林崇康 (48)

新会城内行公栈与“八大市头”.....

.....黄 相 (50)

古兜贼头黄胜当“官”经过.....许梓堂 (54)

我的甘天羊牯生活.....廖北和 (61)

陈林械斗双方的损失.....何 棠 (65)

新会城街名考.....朝 练

如政路 (40) 汇泗里 (60)

回忆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补充

欧阳可羽

去年，我写了《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的回忆》之后（见本刊二十三辑），得到师友们热情鼓励和欢迎，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我继续查访了一些有关资料和西江乡师创办人陈洪有校长等，再加忆述，以作补充。

（一）西江乡师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

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社会在教育领域里，兴起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教育，匡互生的生产教育和人格教育，还有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思想等等。西江乡师的创办，就是吸取当时这些新兴的教育思想，试图在广东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培养乡村教育建设人才。

我问过陈洪有校长，当时为什么要吸取这种思想来办学？他说：我们开办西江乡师的人，都是来自农村，我们当时对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感到十分苦闷。中学毕业后，我和梁朝令去上海，准备半工半读，结果，我们于1929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在学习期间，知道陶行知于1927年在南京创建“晓庄学校”（原名叫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一时名声传播全国。我和梁朝令、叶渠均、廖北和等人，相约到那里去参观访问。后

受到陶行知在茅草盖顶的圆形礼堂“犁官”里接见，并参观学习了两天。随后，叶渠均的妻子区巾雄在新会师范高中毕业，即到那里学习一年多，直至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才离开。创办西江乡师时，就吸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为楷模。

又说：劳动大学创办人之一匡互生教育思想对我影响也很深。1925年匡互生与丰子恺、朱孟实、陶载良等人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立达的制度与其他学校不同，没有校长，也不设主任等职称，实行“教导合一”制，对学生实行“说服主义”，师生间同父母子女一般亲热。1929年增设农场，开办“农村教育科”。匡互生提倡生产教育与人格教育，以生产教育求人格教育的充实，我们是匡互生的崇拜者。这个问题著名作家巴金在《病中集》有这样的记述——

“我和一位广东朋友（陈洪有——引者注）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第61页，1984年人民文学版）

在当时诸教育前辈的新兴教育思想熏陶之下，我们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劳动大学毕业以后，1931年回到新会，就积极创办西江乡师。在西江乡师开办期间我与梁朝令、廖北和、叶渠均、陈毓就、刘家沃等人，在新会《四邑民国日报》编辑《乡村与教育》副刊，探索教育改革的道路，以求在广东因地制宜，建立一所新型的学校，树立一种新的教育思想。该副刊是从1932年5

月创办，至1934年西江乡师迁离新会时停刊。共出版过五十多期共约30万字。1934年，西江乡师又出版《学术月刊》两期，也因迁校而停刊。这些刊物，无疑是为西江乡师摇旗呐喊，为西江乡师自我宣传。可惜现在无法找到了。

他又说：西江乡师在教育方法上，有一部份是借鉴“道尔顿制”的。这种“道尔顿制”教学制度，那时由美国传入，颇受我国教育界重视，有些学校争相仿效。它改革教室成为各科的作业室，按学科性质进行布置供学生学习使用；它废除课堂讲授，按课程内容制订学习任务，由学生自行学习；它体现了一种教学改革的精神，符合西江乡师提倡的培养和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的要求。西江乡师根据学校具体情况的需要，自编教材，在校园、花园、菜地或畜牧场上课等等；而且在规定的课程以外，更充分组织各种学习班组，提出各种内容的学习提纲，在辅导员的辅导下，由学生自行学习。这都是借鉴“道尔顿制”而得到启迪所采取的方式。实践证明，学习气氛浓厚，主动性自觉性较强，都取得过良好的效果。我相信从教育改革入手，能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凭这点热心，向教育界前辈学习。他还拿出旧笔记本给我看，说这些零碎的资料，就是我们创办学校时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基础。

我就摘抄一些：

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立达学园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所谓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是“尽己”的；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是“善群”的。

立达学园的简章上规定，注重人格感化，凡形式的奖惩、

繁琐的规则，一概不用。匡互生还主张：知识原是重要的，但授与知识，却不是学校唯一重要的使命……倘使学生都各自能养成优良的品格，知识缺乏一点，似乎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在全人类生活中看来，排字工人和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的重要。坚信劳动可以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可以使我们领略创造的快慰，可以使我们独立生活。

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值得抄录的还有西江乡师制订的《我们底信条》。全文是这样的：

第一、革命的精神：

（一）革命要先从自己革起；（二）牺牲一己利益制造众人幸福乃天下之大勇者；（三）破除一切封建思想及个人主义思想是革命之出发点；（四）改造乡村是改造中国社会之前提，也就是改造世界之前提；（五）以革命为中心的教育才是真教育。

第二、科学的头脑：

（六）思想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才能产生出合理的行动；（七）要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才能应付实际的生活环境；（八）用科学方法支配工作，是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劳动的身手：

（九）劳力劳心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十）强健的体魄为事业成功的基本；（十一）凡是人都不应该寄生在别人的劳动力上；（十二）真实的认识是从实际劳动生活中体验得来的。

第四、艺术的行为：

（十三）真实的艺术是以劳动的创造为实质的；（十四）以艺术代宗教；（十五）个人底自由不能违反全体的一致；（十六）心境愉快，行动勇进，乃事业成功之基础；（十七）人对人对己对事物惟忠信与真诚乃行为之正宗；（十八）惟友爱与互助是人底本分。

上述的方针即是我们同学口头所说的“四化教育”。

1933年4月4日西江乡师举行周年纪念大会，出版《西江乡师周年概况》。陈洪有就携带《概况》北上进行教育考察，5月底返校。陈这次北上，既是进行教育考察工作，以充实和提高教育改革作实质性的研究，又是宣传西江乡师创办后的工作成绩，以争取国内文化界、教育界的支持。

随后，东南大学师范科毕业的叶子群来校担任小学部主任，国立东北大学教育学士洪一苇，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章乃焕相继到校工作，为西江乡师进行教育改革工作增添新的力量。

我最近还就1933年五六月间省教育厅督学何名沫来校视察一事，请陈洪有谈谈当时的情形。他说，何名沫督学来校视察多日，曾作各方面的深入了解。那时正是我校周年校庆过后不久，我刚从各地考察教育归来，何督学对我校教育改革工作甚表赞扬。年底，我校即接获省教育厅批准立案，这是与何督学的同情与支持有关的。不久，新会县政府转省教育厅的批复，批准我校开办，并改名为新会县私立西江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修业期改为四年。对于这一批令的下达，我校曾拟订出补救办法，即是在校肄业三年，修完各科四年课程，不放寒假暑假，共计有四个寒假四个暑假的时间（校外实习时，寒假暑假可回校修业），可以补足实习时那两个学

期了。至第四年出校实习，便不需家庭供给伙食了。有此办法，贫苦学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见《西江乡师二周年概况》）这一补救办法，得到全校同学的欢迎，也激发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与学业成绩。

西江乡师进行教育改革工作，受到国内及省内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对社会的影响颇大。1933年冬，鹤山县立第二乡师学校派员来我校联系，请求派出教师协助该校进行教育改革工作，学校派张慕良辅导员前去。陈洪有回忆道：当时鹤山县立第二乡师校长是和鹤山县教育局局长同来的（局长姓名已忘记，事后才得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在校务会议上讨论过，张慕良主动提出前往。但是，张慕良去了不久，鹤山县政府便改组了第二乡师学校，该教育局长也被撤换。

那时，鹤山县有《鹤人周报》出版，发表过一些介绍西江乡师学校生活的文章，对西江乡师创办精神和教育改革工作多所赞许，可惜《鹤人周报》现在无从查觅。

西江乡师对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还可以从前来我校参观访问的情形反映出来。以1933年5月为例，前来我校参观访问的就有新会县立第二中学、江门国民大学附属小学、新会世德小学、新会县第三区第二小学等校师生。平时来校参观访问的也接踵而至。连新会县合作事业指导员办事处也派员前来我校访问，并抄录我校有关农村调查资料。

还可以提起的是1933年暑假期间，新会平山小学教师李载伯，特意前来我校度过一个暑期生活，可见他对西江乡师学校生活很感兴趣。

除这些外，当年到西江乡师来参观访问的教育界和社会

闻人，也是频繁。如岭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朱有光，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崔载阳，江苏无锡教育学院院长余庆棠，上海《申报》编辑俞颂华，广西大学校长雷宾南，勳勤大学校长林励儒，还有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等等，都不避道途跋涉，先后来校参观指导。这些教授、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来看看我们进行教育改革的工作实际情况的。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当年作为西江乡师的客人，对西江乡师教育改革工作，写了多篇赞美的文章，收集在《旅途随笔》一书里。巴金还对西江乡师的教师和同学发出了深厚的怀念。他在1983年8月22日与的一篇《怀念一位教育家》中说：“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并说：“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病中集》1984年人民文学版）。

巴金在这里说的“坚定的信仰”，也就是上述陈洪有所说“相信从教育改革入手，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些话正好用来解释当时社会上不少人怀疑西江乡师的辅导员为什么肯牺牲个人本来可以在社会获取较好的待遇而却聚拢来这里咬菜根的思想了。

（二）两次被迫迁校成功地转移的原因

由于西江乡师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与当时一般学校迥然不同，社会上早已有了流言蜚语。但它受致命的迫害，却是在1934年新会县长黄槐庭视察我校后，通过簠庄的封建势力，要收回四座欧阳氏族大祖祠开始的。跟着便制造夜间假演习对学校进行骚扰，造成同学冯泰泉的溺死。同时放出种种谣言，使学生人心惶惶，不安于学习。这一系列阴谋，目

的无非将学校搞垮而已。但我们却没有垮下去，却能成功地转移。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学校已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获得社会有心人士的同情。而西江乡师全体师生也珍惜两年来的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得来的成果。所以就能够同命运、共呼吸一致行动。

在我们学校决定迁移时，迁到那里去？这是首要的问题。本县尽管有时地区可以把学校安置下来，但大家都知道逃不出县太爷的掌心，必须迁离县境。当时我校校董会主席朱赤霓（原主席为邓泽如，以政务繁忙辞职，1933年由朱继任）则认为附近无适当地点，必要时可以迁到海南岛去。因这时朱任琼崖实业局局长，故有是说。到了是年暑假，仍未找到适当校址，陈洪有乃约同友人伍觉天（现任省政协副主席）以开发琼崖实业考察教育为名，一同到海南岛去。他们在琼崖实业局的支持和协助下，到了文昌县和澄迈县选择校址。归来后，便同同学们作宣传动员工作，说海南岛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土地辽阔，气候温和，适宜于办农场、建工厂、开矿务，说什么琼崖实业局正在有计划地大规模种植橡胶树，发动华侨资本家到琼崖兴办实业，建设码头，开采岛内铜矿、锡矿。还说某处发现金砂，冶炼出黄金。只是那里的教育比较落后，正需要我们这样的学校到海南岛去，团结民众，共同奋斗。要把西江乡师的教育改革，兴办农场，开设工厂，培养人才，实行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在海南岛扎根下来。他用美丽的言辞，给同学们引进了理想境界的社会。说得天花乱坠，使人兴高采烈。我记得陈洪有当时情绪兴奋激动，号召全体师生发扬两年多来创建西江乡师的精神和勇气，发挥大家聪明

才智，继续团结奋斗。最后他振臂高呼：到海南岛去！

然而那里没有可作校舍的现成房屋，就是茅棚也要一笔费用才能搭得起来。可是我们西江乡师连校长教师都没有什么工薪报酬，那来一笔建校费、搬迁费。陈洪有心中当然有数，为了安定师生情绪必要装腔作势鼓励同学们坚持下去，一面继续分头活动另找出路，恰好番禺县长梁翰昭是有心人（何人关系认识梁县长，已难复忆），以番禺沙田区的鱼窝头教育落后正需发展，就介绍了鱼窝头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陈伯元与西江乡师合作，欢迎西江乡师迁到那里搞农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合作社腾出房屋，拨出耕地，迁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据我的记忆，当陈洪有把迁到鱼窝头这一决定正式向同学们宣布的时候，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发出了胜利般的欢呼。会后同学们议论着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新名词，向往着将生活在一个新的农村环境之中，憧憬着“新型农村社会在萌芽”的远景。在当时的环境中，到蜜烟瘴雨的海南岛去，同学们尚且表示愿意，何况是邻县？大家听到消息，自然欢天喜地。

我们这次迁校，师生们没有一个掉队，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是什么动力所驱使？问题是很简单的，首先是西江乡师在教育改革中，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无论在学校建设、校务管理、教学活动、劳动生产以及课余生活诸方面，师生都是打成一片，同食同住、同劳动、同商议，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象兄弟姊妹那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其次，我们同学都是来自农村的贫苦人家，平日受到地主土豪的欺凌压迫。现在学校也无故遭受迫害，面临垮台

之灾，将断送我们学业和前途。故此，人人满腔激愤，团结一致，共同行动。

鱼窝头虽是沙田区比较闭塞落后，但作为教育和劳动相结合，鱼窝头的环境，却比簪庄好。因为该处农业生产合作社拨有近百亩的田地给我们作实验园地。有了实际的生产基地就会增加学校经济收入，改善师生们的生活了。我们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埋头苦干，种下甘蔗等农作物生长正在欣欣向荣的时候，突然间，民政厅长林翼中委派了番禺县的新任县长林世恩，以男女同河游泳，有伤风化的罪名，下令学校迁离县境。我们学校于1935年2月，别离簪庄乡迁到这鱼窝头，仅仅一个学期光景，又遭此无情的打击，在那读经复古的气氛中，这个罪名是无从申辩的。这位番禺林县长的手段是比新会黄县长横蛮多了，黄县长只用阴谋手段而没有直接下令干涉，可能因为同是新会人，投鼠忌器，未便当面下杀手锏，而这位林县长到任坐席未暖，便暗访找到这种“罪名”作为借口而下令驱逐，在此情况下，西江乡师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了，只有作第二次转移。这时候学校经济更为拮据，有些班级学生毕业了，学费来源减少。而搬到鱼窝头又用了一笔费用，种下的甘蔗又未有收成。几经周折，才在广州郊区泥城找到了一间已经歇业的厂房，认为这里既有现成的可容纳百余人的建筑物，还有一些旷地可供学生活动，也就租了下来。这次师生们心情无限激愤，然而又无可奈何，因此在当年暑假期间便迁到广州泥城。一年之间，两度被迫迁校，而师生们行动却能坚持一致，迫不垮，正表示了我们反动势力面前决不低头，斗争到底。

（三）校务体制和教育改革

西江乡师自创办之日起，即坚决实行教育改革。它的校务领导体制就和当时一般学校大异其趣。所谓校董会是为着应付向政府立案而设置的，从来没有开过会，校长是当时几个创办人互相推选出来是对外电，校内师生一律平等，学校不设“训育主任”，而所有教师对学生都负有品德教育的责任。1933年下学期，陈洪有北上考察教育回来后，对学校的领导体制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公布了“西江乡师实验新教育的组织系统”。设校长主持校务会议，领导“五部两委”，即总务部、生产部、学术部、社会部、小学部，暑期生活委员会、招生委员会。

总务部下设文书组、会计组、庶务组、考核组、食事组、图书组、健康组、出版组、劳作组、交际组、消费合作组。

生产部下设农艺组、园艺组、养蜂组、畜牧组、农副业制造组。

学术部下设语文组、社会组、教育组、农学组、史地组、数理组、博物组、艺术组。

社会部下设地方自治组、农村调查组、民众教育组、农业改良组、戏剧组。

小学部下设总务组、校务辅导组、课程辅导组、生活辅导组、社会服务组。

各部委在辅导员领导下，推选同学参加各组工作，实行师生民主办学、教学做合一的实验新教育。各部委的全体会议，称为“辅导会议”，代表全校师生执行校务会议的決定。采取民主办学校的方式。同时，还宣布西江乡师的宗旨是：培养乡村教育人才，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我们学校听不到什么“校长训话”、“主任训话”之类的言词，我们流行的说法叫做“谈心”，有师生或者同学间在一起的谈心，有全校師生在一起的谈心会。我们的谈心会每两周举行一次，通过谈心或谈心会，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实际问题，往往就能得到解决。

谈心会上，无所不谈，各抒己见，有时也会发生争论。如果争论的问题牵涉比较广泛，学校就会组织举行“辩论会”。

组织辩论会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选定论题，组织同学参加，找资料，写提纲等等，锻炼同学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我校提倡艺术化教育，培养高尚品德，讲究文明礼貌，开展了名为“生活习惯革新运动月”。如1933年12月举行一次生活习惯革新运动月——铲除糊涂运动月。要求办事情做工作、说话、思想，不得糊涂，做到清楚明白，信守无误。在运动月里，制订出几条具体行动准则：一、依计划生活；二、遵守学校生活秩序；三、对人对己不糊涂，不合理的举动不应做；四、读书做作业不糊涂；五、做事不糊涂；六、思想不糊涂；七、铲除其他一切糊涂习惯。这七项准则，还各有具体内容，例如使用公共东西要检点，不随便散失；对人对事、对物，头脑须清醒，有正确理解；课业必须切实做妥，不敷衍了事，等等。提倡人人自我实行，大家互相帮助。

以后，1934年1月举行第二次生活习惯革新运动月——力行运动月。1934年2月举行第三次生活习惯革新运动月。

——礼貌运动月。以后还有整洁运动月。这样的运动月，还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1933年10月我校举行第二届体育运动会时，提出体育运动与生产劳动教育相结合。除进行一般体育项目比赛外，还安排了爬山、划艇、挑重，以及浇菜、捆扎、结绳等表演项目。

我们同学也开展过一次以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包办婚姻的思想教育工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大事情。1933年秋，程苏澈辅导员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来到我校的。原来，他是由于婚姻问题，抗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毅然离家出走的。程苏澈的反对封建婚姻，离家出走的行动，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被誉为革命行动。当时我所参加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组”首先进行讨论，出版壁报，控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继而从图书馆里端出一本以描述十九世纪末叶俄国革命时期虚无主义者当时流行的“假婚”故事的小册子《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来，大肆鼓吹，提出应该采取“假婚”的办法对付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应，大家都谈论“假婚”的故事。当时有一位女同学差点儿要为了反对封建思想，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试图表演一场“假婚”。辅导员们是不赞成这样的“假婚”把戏的。

同时，同学们也知道陈洪有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典型例子。陈在上海劳动大学念书的时候，母亲不顾他的反对就在新会城为他物色了一位姓杨的姑娘，那杨姓姑娘的父母便送女儿到新会女子中学去读书，以为女儿中学毕业，堪配一位大学生郎君了。后来陈的母亲居然在乡间